

我与聊城晚报的故事

《聊城晚报》试刊号,他珍藏了近20年

文/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

11月20日,走进位于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家属院的杨飞收藏工作室,记者看到,墙壁上悬挂着各类书画作品,整个房间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交谈中记者得知,从2005年起,杨飞就与《聊城晚报》结缘,十几年来一直是晚报的忠实读者。在他家里,记者看到一份特殊的报纸,这是2004年7月19日出版的《聊城晚报》试刊第1期。近20年里,报纸除了有些发黄,并没有明显褶皱,被保存得相当完好。“除了咱们的试刊号,之前订报赠送的带有聊城晚报Logo的水杯和水壶、《聊城晚报》创刊十周年纪念册等,我也一直珍藏着。”杨飞说。

“《聊城晚报》是我的精神食粮,给我提供了很多营养。”在杨飞看来,《聊城晚报》里有柴米油盐、吃穿住行,也有文史钩沉、诗和远方,每天读一读,都会有不少收获。

“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老胡同、老街巷很多,我本人又对文化非常

感兴趣,所以关注最多的是晚报的文化版面。”杨飞举例说,《聊城晚报》开设的“聊聊文物”“你所不知道的聊城”“两河之约 聊城手造”“临清胡同游”“桥见聊城”等栏目稿件他都很爱读,受益颇多。

“这篇关于‘聊惠保’的报道也不错,交了这个保险有啥用、今年的保障方案有哪些升级、医疗费用年起付线是多少等等,相关信息都解释得很清楚。像这样的报道,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,也是咱们老百姓关心的,在这方面,《聊城晚报》做得相当不错。”杨飞指着11月16日《聊城晚报》上一篇关于“聊惠保”2024年度产品的新闻报道,对记者说。

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,杨飞也比较关注与养老相关的话题。“我今年五十多岁了,作为一名老读者,如果说有什么建议,那就是希望以后能从晚报上看到更多关于养老方面的新闻报道。感谢《聊城晚报》多年来的陪伴,祝愿她的明天更美好!”



▲杨飞向记者展示《聊城晚报》试刊号

▶杨飞收藏的《聊城晚报》和纪念品



口述

我的古城记忆

在红星影院看电影

□ 李晶

小时候,在古城生活的那几年,看电影看戏绝对是一件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事儿。那时候,城里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在楼北的红星街上,叫红星影院;还有一家在高楼东南方向的新华广场,叫新华剧院,既放映电影又组织演员唱戏。

上二年级时,我住在聊城实验小学南边郁光街的大舅奶奶家,她带我去东边的新华剧院看过《窦娥冤》《李慧娘》和《西游记》中的《盘丝洞》。《盘丝洞》是一部戏。演出时,我和一群小孩子趴在舞台沿上,猪八戒扛着钉耙子一上台,地板不但咚咚响,还颤悠悠的,我们就笑;孙悟空大战蜘蛛精时,累得呼味呼味的,我们更是忍不住发笑;看着蜘蛛精从肚脐眼里吐丝,我们瞪圆了眼睛;等猪八戒被丝缠住,左冲右突却被缠得更紧时,就有小孩在舞台前面的空地上撒欢狂奔,开心得又蹦又跳,直到被大人的呵斥声制止。

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真正的剧院。先前在农村老家看《南征北战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什么的,都是在露天场院里看的。有时观影的人多,我们小孩子还会跑到银幕后“反着”看电影。到了城里才知道,看戏看电影是可以坐在大房子里的木质连椅上,风不吹日晒雨不淋地看个痛快的。也是在新华剧

院,我知道了座位是分单双号的,找座位时,按不同的号,从不同的门进入寻找。所以,到我大姑带我去红星影院看电影时,我就以一种炫耀的心情跑到前面准确地找到座位,然后仰着脸等着她的夸奖。

上三年级时,我寄宿在大姑家。当时大姑刚结婚不久,还没有自己的孩子,我就成了他们家唯一的孩子。

一天,大姑下班回到家后兴冲冲地说,听说红星影院演《春香传》,是朝鲜电影,挺好看的,咱们晚上去看电影吧。

一听看电影,我的小眼睛立刻就瞪圆了。当裁缝的大姑放下手里的剪刀和画粉,说,去!不干活了,看电影去!然后对我说,抓紧吃饭,别晚了。几点的电影?快快快,别炒菜了,吃饭吃饭!

我们风卷残云地吃完饭,我边穿棉袄边用力咽下最后一口馒头。大姑把棉衣扔给大姑父,说,穿上!然后自己也找了一件棉大衣穿上,就牵着我的手往外走。

寒风呼啸,大姑棉大衣的衣襟上下翻飞,她一手裹紧大衣,一手抓着我的手放在她的棉大衣口袋里。寒风吹不灭我们要看电影的满腔热情,绕过古楼向北顶着风走了几分钟,在北口向东一拐,红星影院就在眼前了。我更紧地抓住了大姑的手,手心里似乎要冒出汗

来。门口排起了两列长队,大姑指挥大姑父赶紧去买票。大姑父穿过长长的人龙,艰难地“游”进去,又举着票艰难地侧着身子“游”出来,兴高采烈地说,最后三张!最后三张!

这简直就是幸运票!大姑紧走几步,把大姑父从拥挤的人群缝隙里拽出来,说,快快快,快开演了,快去找座位。

检完票,我自告奋勇地去找座位。原来和大舅奶奶看戏时,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对号入座。现在,到了我表现的时候了。

扒拉开通道上的人找到座位,还未坐下,一个人冲大姑父喊,二哥,来看电影啦?

哟,你也来了?大姑父赶紧答话。那个人意味深长地看看大姑,再看看我,冲大姑父挤眉弄眼地说,全家都来看电影了?然后用肩膀撞了一下大姑父的肩膀,看着我小声问,带来的?(因为大姑父的一条腿有点跛,娶到如花似玉的大姑,足以让一些人好奇。)

哪呀,你二嫂子的娘家侄女!大姑父说。

大姑也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个人,她知道那个人的意思,说我是大姑带来的孩子。那人尴尬地冲大姑笑,说,二嫂子好,侄女好。

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。不久又看了另一部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

时隔多年,电影的内容已不记得了,现在有印象的也只有那些与我们的服装完全不同的朝鲜族服装了。

后来,我还在红星影院看过《今天我休息》《戴手铐的旅客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等电影。那时候,去红星影院看电影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儿。看一次电影,值得向小伙伴们炫耀好长时间。

1983年我去聊城一中读初中了,班里有个同学的妈妈就在红星影院检票,她家住在影院旁边。那时候我大姑已经从楼西大街的出租房搬回了她马宅街的家,并且盖了新房,开了服装加工店,生意红火。红星影院与我大姑马宅街的家相距不过300米。初一的那个暑假,我给大姑看孩子、做饭,只要得空,我便趿拉着拖鞋,一路走过马宅街,走到街口老监狱的高墙处,往北走向红星街,在影院门口与焦急等待我的同学相视一笑,携手欢快地跑进影院,找一个空位,往上面舒适地一躺,随便看一场正在上映的电影,度过一段快乐时光,看完飞快跑回去,计划着做一顿什么样的饭吃。

现在那个同学已在加拿大定居多年,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四十年前我们一起看电影的快乐时光。

看过的电影早就隐没在时光里,但时光不老,记忆便不会消失。

(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